

ISSN : 1226-850X

# 中國學報

第九十七輯

2021年8月

韓國中國學會

中國學報 第97輯 編輯委員

편집위원장: 차태근(인하대)

총괄편집이사: 민경욱(경기대)

語文學部

김순진(선문대)

이소동(숙명여대)

최석원(제주대)

노혜정(고려대)

史學部

김용찬(전북대)

김선민(고려대)

장수지(연세대)

哲學部

김혜수(부산대)

박영우(성균관대)

방현주(건국대)

中國學報

第九十七輯

2021年 8月 26日 印刷

2021年 8月 31日 發行

發行人 金 宜 鎮

編輯人 編 輯 委 員 會

印刷處 韓 吉 文 化 社

Tel. : 02) 887-9188

E-mail : hg9188@chol.com

가격: 20,000원

發 行 處

韓 國 中 國 學 會

## 目次

### 語文學部

---

《訓蒙字會》 ‘俗呼’ 研究 .....	이현선 .....	3
화용 기능의 ‘又’ .....	박은석 .....	35
致使、非致使状态变化(COS)比较研究 — 英语、韩语和汉语之比较 .....	李슬기 .....	65
조동사 ㅅ의 의미에 대한 새로운 관찰 .....	정현애 .....	87
한국어 명사절 내포문의 중국어 대응 관계 연구 — 한·중 병렬 말뭉치를 바탕으로 .....	동 초 .....	105
蘇軾 詩의 韓愈 詩文 인용 양상과 그에 따른 宋詩의 특징의 심화 .....	류소진 .....	133
동진시대 才女 謝道韞에 대한 17세기 조선 사회의 수용 연구 .....	김정숙 .....	163
俞樾 『古書疑義舉例』의 성과와 한계 .....	김효신 .....	195
『藝林品彙』 연구 .....	홍혜진 .....	223
豫劇豫西調源流探析 .....	伊 河 .....	265
중국 神話資源 토론의 현주소 .....	홍윤희 .....	297
关于周作人及其散文创作中“故乡情结”的探析 — 以浙东文化为中心 .....	蔡 捷 .....	325
해방 10년, 바진(巴金)의 저작물 번역 연구 .....	엄진주 .....	359

선스시(沈石溪) 동물소설에 구현된 모성의 열림과 닫힘  
 — 중·단편소설을 중심으로 ..... 신주리 ..... 387

見名知義  
 — ‘新生代’ 문학命名에 대한 淺析 ..... 于翠玲 ..... 411

毛澤東, 共青團, 老紅衛兵의 혁명의 후계자 담론 비교 ..... 김준호 ..... 433

키워드 통계 분석을 활용한 중국의 교육 연구 동향 분석  
 — 13차 5개년(2016~2020) 기획 기간을 중심으로 ..... 박지현, 김민정, 노규형 ..... 461

## 史學部

---

建筑考古视角下凤林古城空间特点探究 ..... 陈彬彬, 董健菲, 韩东洙 ..... 485

중국의 북한과 베트남 정책 연구, 1949~1964 ..... 한상준 ..... 505

## 哲學部

---

청세조 『도덕경』 어주의 ‘무위’관념 연구 ..... 김태용 ..... 531

도올 김용옥의 『노자』 이해의 특징과 맥락 ..... 박원재 ..... 555

선진유가사상에서 확장기제로서 우정의 역할  
 — 『논어』와 『맹자』를 중심으로 ..... 이정인, 김도일 ..... 579

論錢穆對漢代『春秋』學的研究 ..... 楊兆貴, 趙殷尙 ..... 601

# 論錢穆對漢代『春秋』學的研究

楊兆貴\*·趙殷尙\*\*

## 目次

- I. 引言
- II. 錢穆談孔子與『春秋』
  - 1. 錢穆談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的特點
  - 2. 錢穆從『公羊』學精神談孔子作『春秋』的精神
  - 3. 錢穆談『春秋』三傳
- III. 錢穆評論漢代『春秋』學
  - 1. 錢穆對漢代經學‘今古文’的看法
  - 2. 錢穆論漢代『公羊』『穀梁』設置博士及其家法
  - 3. 錢穆論劉歆請建『左氏春秋』等古書及『移讓太常博士書』
  - 4. 錢穆論漢代『春秋』經義經說
  - 5. 錢穆論『春秋』與漢代學風思潮的關係
- IV. 結語
- 參考文獻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I. 引言

錢穆先生(1895~1990, 下為行文便, 皆直稱學者姓名), 字賓四, 江蘇無錫人。曾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教授, 創辦新亞書院。錢穆治學, 融通中西, 貫通四部。他1932年在北大開‘秦漢史’課, 後著有『秦漢史』。另, 他的名篇『劉向歆父子年譜』刊於『燕京學報』1930年第7期, 名震學界, 廣受推崇。<sup>1)</sup>又, 『春秋』是五經中極重要的一經, 它、注疏者與每一時代思潮、學風都有密切的關係。一生尊崇孔子、服膺儒學的錢穆對

\* 第1著者: 中國澳門大學 / 教育學院 / 副教授

\*\* 交信著者: 韓國培材大學校 / 周時經教養大學 / 副教授

1) 名家對此文的推崇, 見朱愷: 『錢穆的漢代經學研究』, 上海大學, 碩士論文, 2010年, 第1-4頁。

漢代、『春秋』這部經典素有研究，頗多新見，應值得我們重視。錢穆對漢代史、經學、『春秋』學皆有論著，對學界產生重要影響。這方面最重要的最有特色的看法是認為漢代經學今古文之別是王官學與百家言(諸子學)之殊，且以此貫穿他的漢代『春秋』學研究。本文先從這幾方面論述：錢穆對孔子(前552-前479)『春秋』及『春秋』三傳的看法，他在不同時期對『公羊傳』與董仲舒(前179-前104)的評論。特別一提的，是錢穆撰寫『孔子與春秋』一文，特地闡揚『公羊』學精神，這在錢穆『春秋』學研究裡有特別的意義。最後，論述錢穆對漢儒『春秋』學經說經義的特點、『春秋』學與昭、宣以後學風思潮(尤與災異說、禪讓說)的關係。錢穆認為西漢經學在中國史上有較大的貢獻，因此他的論述絕大部分是論西漢。<sup>2)</sup>錢穆對秦漢史、漢代經學研究飲譽學林，影響很大。他這兩方面的論著大多已逾半世紀，在出土文獻日益增多、研究方法多元化等學風下，他的論著仍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筆者結合他這兩方面的研究，聚焦他的漢代『春秋』學，以見他治學、見解之一斑。有關錢穆漢代經學、『春秋』學研究，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並發表了相關論文，很有參考價值。<sup>3)</sup>本文希望在先哲時賢的研究基礎上，對此問題有一整體的論評。

## II. 錢穆談孔子與『春秋』

### 1. 錢穆談孔子作『春秋』及『春秋』的特點

要論述錢穆對漢代『春秋』學的論述，應先論述他對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三傳的看法。錢穆一生對『春秋』的看法、評價有所變化。他早期的評價不太高，晚年則予以高度的評價。

有關孔子是否作『春秋』問題，曾是學界討論的熱點。<sup>4)</sup>錢穆在三十一歲左右寫成的『國

2) 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年，第209頁。

3) 就筆者收集到的論著，主要有：李桂花，「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與現代疑古運動」，『思想戰線』2001年第4期；林慶彰，「錢穆先生的經學」，『漢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5年12月)；姚淦銘，「錢穆兩漢經學研究之方法論」，『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江毓奇，「論錢穆對於“漢代經今古文”論爭所涵蘊問題之處理」，『問學集』，第15期(2008年4月)；朱愷，『錢穆的漢代經學研究』，上海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陳雅玲，「試由〈劉向歆父子年譜〉論錢穆的疑古與考古」，『衍學集』2011年7月；曹明，「錢穆〈漢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史意義」，『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陳勇，「錢穆與〈劉向、歆父子年譜〉」，『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林惟仁，「錢穆論兩漢今古文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9期(2016年9月)等。學界這十幾年來對錢穆漢代經學觀點的研究，可參江毓奇，「論錢穆對於“漢代經今古文”論爭所涵蘊問題之處理」註4。

學概論·孔子與六經』裡，贊同孟子(約前390-前305)<sup>5)</sup>的孔子作『春秋』之說。他雖然贊同孟說，並認為『春秋』“有功於文獻”，但認為它“粗略簡陋，亦不勝後儒之尊美。”<sup>6)</sup>可見他當時對『春秋』的評價不太高。他六十歲以後對『春秋』的評價極高，1964年發表『中國古代散文——從西周至戰國』，從文學角度肯定『春秋』的字法、句法、結構影響後世中國散文，並稱讚孔子是偉大的文學家。<sup>7)</sup>這一看法比較新穎。

錢穆1970年(七十六歲)在中國文化學院博士班講‘中國史學名著’，詳談自己對『春秋』的看法，可作為他的定論，其要點如下。

一，錢穆把『春秋』當作史書而非經書，說『春秋』是中國正式第一部史書。<sup>8)</sup>他贊同章學誠(1738-1801)‘六經皆史’(『六經』是政府的檔案)說。<sup>9)</sup>如此，『春秋』既是歷史檔案，又是史料。然而錢穆指出，孔子『春秋』與魯國『春秋』不同，是前者根據後者而修改的，修改的是文辭，而非史事。<sup>10)</sup>錢穆特地推崇孔子『春秋』，說它是編年體史書，春秋前後242年，逐年逐月記載，有事則記，無事則闕。錢穆用‘偉大’兩字高度評價孔子『春秋』，並進一步稱譽它不僅是魯國史，而且是霸政史、世界史、人類文化史。<sup>11)</sup>可見，錢穆從歷史方面對孔子『春秋』推崇備至。

二，錢穆根據『孟子·離婁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闡述孔子『春秋』的特點。他特別稱譽孔子『春秋』的用字和義理。從用字來說，孔子“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從義理來說，錢穆特別闡述孟子所說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說這是所謂的‘歷史批判’。<sup>12)</sup>錢穆從學術史說，孔子把王官學『春秋』改為私家著述，把政府官史轉成民間私史，

- 
- 4) 有關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一般來說，傳統認為『春秋』是孔子所作。詳鄭良樹，「論“孔子作『春秋』”說的形成」，『百年漢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7年，第167-184頁。現代學者分為兩派，錢穆、白壽彝等指出孔子作或修『春秋』，錢玄同、顧頡剛、楊伯峻等持相反意見。當代學者如李威熊(『中國經學發展史論』)、張以仁(『春秋史論集』)等多反駁後者。
- 5) 本文有關先秦諸子生卒約數根據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附諸子生卒年世約數』，上海：上海書局，1992年。不注明頁數。
- 6) 錢穆，『國學概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第8、13頁。
- 7) 錢穆，「中國古代散文——從西周至戰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臺北：三民書局，1977年，第558-573頁。
- 8) 錢穆指出，『尚書』記載的史事雖然比『春秋』早，但它仍保留一些文件或檔案，因此，嚴格來說，『春秋』是第一部史書。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3冊，第21頁。
- 9) 錢穆，『孔子與春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8冊，第278頁。
- 10)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29頁。
- 1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22、26-28頁。
- 12)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26-27頁。

也即孔子以百家言(諸子學)著作代替王官學(這點『孔子與春秋』詳闡。這也是錢穆最推崇備至之處)。<sup>13)</sup>

錢穆認為當前研究『春秋』，應從大義著手。『春秋』大義是誅亂臣、討賊子(此關乎重整政治社會秩序、家庭倫理)，內中國、外夷狄——夷夏之辨的觀念。他反對過分探求大義，否則反而落入小節中，會越講越使大義暗晦。因此，他反對杜預(222-285)定出五十條例，認為這求之太過。<sup>14)</sup>

錢穆晚年認為孔子『春秋』是一部編年史，應與近世以來批評經典的思潮有關。近世學界由疑經而疑孔而疑古，顧頡剛(1893-1980)更視經學為史學，變史學為史料學，影響極大。<sup>15)</sup>雖然錢穆不贊同顧氏此說，但是他曾與顧氏交遊頗密。<sup>16)</sup>彼此的學術見解或有不同，但互相影響。<sup>17)</sup>因此，他也從史學角度來闡述孔子『春秋』學的特點。錢穆對『春秋』有比較特別的看法，就是他提出『春秋』是第一部民間私家著作，後成為五經之一，『春秋』融王官學與百家言為一。這是他的理想著作。『孔子與春秋』一文即詳闡此意，並以此論衡漢代及其後各朝代的『春秋』學(詳下文)。

## 2. 錢穆從『公羊』學精神談孔子作『春秋』的精神

錢穆1954年(時歲六十)發表『孔子與春秋』。這篇論文的宗旨，不做『春秋』本書的研究，而是從『公羊』學角度闡述孔子作『春秋』的精神，並從王官學、百家言這兩大學術分野、學術史角度來闡述歷代學者對孔子、『春秋』的看法。<sup>18)</sup>從這篇論文可窺見錢穆對經學大義的看法，他對歷代相關學人不能完全掌握孔子『公羊』學融合王官學與百家言的精神而加以批評。可見，錢穆把融合王官學與百家言的精神視為中國經、史最高標準，這也是他治經、子之學

13)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第26-28頁。

14) 本段引文見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頁30-31。

15) 顧頡剛指出『春秋』為史官所著，史官是君主的幕僚，只反映君主的思想；『春秋』有褒貶筆法，但無微言大義。見丁亞傑，「顧頡剛春秋學初探」，『人文學報』，第23期(2011年6月)，第75-77頁。

16) 劉書惠、楊棟「顧頡剛與錢穆學術交遊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7卷第2期)詳論顧、錢自1929年至1941年交遊甚密。劉俊峰「抗戰時期顧頡剛與錢穆學術理念的離合」(『齊魯學刊』2016年第3期)論述了顧、錢兩人上世紀40年代學術理念同異、交流及其與時代的關係。

17) 如顧、錢對漢代經今古文、陰陽五行說有爭論；錢穆「國史大綱·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一節受『古史辨』影響。兩人學術交流，見顧融德，「試評顧頡剛與錢穆的友情和學術交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2期，第23-25頁。

18)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317頁。『經學大要』也評這篇文章“等於講了一部經學史，也可以說講了一部儒學史。”(『經學大要』，第145頁)

的最高標準。錢穆為了高標此義，在這篇論文裡對『公羊』學、董仲舒深表贊賞。

### 1) 錢穆對『公羊』學、董仲舒看法的轉變

錢穆對『公羊』學、董仲舒的看法並非一成不變的。他在『國學概論』批評董仲舒“其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災異之變言『春秋』，皆非孔子以來儒者之義，亦非『公羊』之本旨”，說『春秋繁露』多引黃老刑名之語，直斥董學以陰陽學為宗，比附儒家，其真面目並非儒家！<sup>19)</sup>這可說發前人所未發，把歷代推崇董仲舒為儒家、儒宗的說法推翻，揭露了董學的‘真面目’！錢穆認為漢代思想大部分以陰陽家思想為主，<sup>20)</sup>董仲舒是罪魁禍首。另，董學是漢儒之學，而非先秦儒學！言下之意，董仲舒未得孔孟儒學真傳精髓，他不應列在儒家道統裡。錢穆對『公羊』的批評態度也相同，指出『公羊』‘三科九旨’之義本於董仲舒『春秋繁露』，而‘存三統’之說尤其可怪，王魯、新周、故宋說不足為信。<sup>21)</sup>可見，錢穆三十餘歲時對董仲舒、『公羊』家的批評頗為嚴厲。

錢穆在1952年出版的『中國思想史』裡對董仲舒思想的論述，繼承了『國學概論』的看法，指出董的思想淵源主要是鄒衍。鄒的思想主要是重建古代天帝的舊信仰，並認為天帝有青、黃、赤、白、黑五帝，配合四方、四時、五色、五行，以此解釋所有物理、天象、宗教、歷史等，它對後代中國思想產生三個極大的惡劣的影響：一是尊神論，其次是尊君論，三是比附附會的思想方法引起後世種種迷信與假科學。<sup>22)</sup>董仲舒思想以陰陽說為主，他的思想也由附會轉入怪異，對以後的思想毒害更深，<sup>23)</sup>漢代學風因而轉入迂怪，只講事象，不求證據。<sup>24)</sup>可見，雖然相隔近二十年，但是錢穆對董仲舒的批評，語氣仍然強烈。

當然，自錢穆撰寫『國學概論』至發表『孔子與春秋』之間的二十年裡，他也不只是從負面強烈批評董仲舒。他在『秦漢史』稱許董仲舒創災異說對限制漢帝專權有貢獻，<sup>25)</sup>並在該書總結董仲舒『天人三策』時，稱讚董是漢代深識之士，剖析當時經濟貧富之理，強調教化，這與他在『國學概論』強烈批評『春秋繁露』屢引黃老刑名之學的看法截然不同。董主張罷黜百家、尊崇孔子，主張封禪、受命之符等，其議被漢武帝所用。<sup>26)</sup>『國史大綱』也肯定董仲舒是

19) 錢穆，『國學概論』，第105-107頁。

20) 錢穆，『經學大要』，第84、91頁。

21) 錢穆，『國學概論』，第109-111頁。

22) 錢穆，『中國思想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4冊，第106頁。

23) 錢穆，『中國思想史』，第105頁。

24) 錢穆，『中國思想史』，第108頁。

25) 錢穆，『秦漢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6冊，第242頁。

26) 以上引文見錢穆，『秦漢史』，第104頁。

漢武復古更化的重要人物，他的『天人三策』與賈誼『政事疏』兩篇文章奠定西漢一代的政治規模。<sup>27)</sup>錢穆1953年發表『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稱讚董仲舒是‘當時最卓越的經學大儒’、‘博通五經的經學大師’。<sup>28)</sup>可見，錢穆從思想史、董仲舒的個人思想角度出發，對董的批評很嚴厲；但從漢武復古更化、限制君權角度言，則肯定董的貢獻。

『中國思想史』出版兩年後，錢穆在『孔子與春秋』裡對董仲舒、『公羊』學的看法與『中國思想史』的看法有一百八十度轉變。他闡釋《公羊家》‘三科九旨’說。雖然錢穆認為『公羊』家所謂‘存三統’不是孔子『春秋』的本義，但是他以『公羊』學說為本文立論之一，並贊同『公羊』家『春秋』三旨論，“則『春秋』顯然是孔子之一家言，而非孔子當時之王官學。”<sup>29)</sup>『孔子與春秋』詳論孔子『春秋』以百家言而成為新的王官學，其立論點就是『公羊』家對孔子『春秋』大義的闡發。錢穆認為『公羊』學對孔子『春秋』所闡發的義理，並非空穴來風，而是遠承孔子。三科九旨說與『論語』所載的孔子思想大有相合處，『論語』所記孔子的言論有些蘊含了『公羊』學義理。因此，要研究孔學，不能捨『春秋』而專治『論語』。這與錢穆一貫主張研究孔子思想，『論語』極為重要說不同。<sup>30)</sup>錢穆因此指出：宋代以前認為研究孔子，『春秋』比『論語』重要；『公羊』所說的孔子精神，彌足珍貴。這跟他在『國學概論』、『中國思想史』批評『公羊』‘存三統’說可怪、王魯新周故宋黜杞說不足信的說法，<sup>31)</sup>已截然不同。

## 2) 『孔子與春秋』概要及其寄寓的理想

錢穆從王官學、百家言角度來闡論孔子與『公羊』學的精神。他認為『春秋』是孔子唯一的、晚年的著作，孔子『春秋』在古代學術史上具有由私家言寫官書(由百家言而為王官學)、為此後戰國百家開山的兩個特點。漢廷立五經博士，一則排除百家言，一則復古之統，尊崇六經即尊古王官學。孔子『春秋』作為五經之一，既是百家言，又是王官學，但它不是舊官學，而是為漢制法的新官學。漢儒深信『春秋』為漢制法說。『春秋』主張新王、禪國、讓賢，成為西漢後期的主流意見。<sup>32)</sup>

27)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144頁。

28)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三民書局，1977年，第8頁。

29)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71、275頁。錢穆在『經學大要』指出伏生說的“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就是所謂“通三統”。它後來成為講孔子『春秋』最重要的一句話(『經學大要』，第87頁)。這是“通三統”說的淵源。按：伏生此句出自『尚書大傳·甘誓』。

30)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316頁。有關錢穆極重視孔子與『論語』，參梁淑芳，『錢穆〈論語新解〉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第9-15頁。

31) 錢穆，『國學概論』，第110頁。

32)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75-281頁。

錢穆所說的孔子以私家言寫官書及以公羊學來闡明的『春秋』精神，寄寓了他的理想：孔子是他的理想人物，<sup>33)</sup>『春秋』這部亦經亦史亦子的著作是他的著作典範——以私家言寫官書，並以私家言成為新官學：

所謂西漢『公羊』學精神，應該包括兩要點：一是戰國新興百家言精神，二是古代相傳王官學精神。而把此兩要點聯結起來，尊奉一家言，把來懸為王官學，這樣便成了孔子『春秋』為新王創制立法的『公羊』學。而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這許多話，也不過想把一切古經籍都歸并到孔子一家言的系統下……若把上述之第一觀點放鬆了，不一定要看重一家言，而重於廣道術，換言之，即是把歷史大傳統來代替一家之尊嚴，則『六經』皆是王官學，孔子以上還有周公，『春秋』之外儘可有『周禮』……若不尊一家言，又不重王官學，把西漢『公羊』家此兩種精神都放鬆了，此即成為後起之經學。<sup>34)</sup>

這段話是本文的重點。錢穆認為我們應該深一層承認『公羊』學在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漢儒尊崇新興的百家言，並代替傳統王官學，也即孔子『春秋』是百家言著作，但漢儒推尊為經，即認為他的個人思想與古聖王思想具有同樣的地位，甚至可以凌而駕之，把它尊為經書，成為漢朝新的指導思想。<sup>35)</sup>錢穆因此稱讚這是漢儒論聖學王道‘特見精卓處’。<sup>36)</sup>這與他在『國學概論』、『中國思想史』裡的態度完全不同。

錢穆高度推崇西漢『公羊』學精神，孔子『春秋』這本亦經亦子亦史之作，以私家言而為王官學，即以民間學術思想作為政府的指導思想，以學術來領導政治，而此思想又與大傳統相融合。這是錢穆的一貫主張，<sup>37)</sup>也是他自信自己極能領會孔子『春秋』這一特點、精神的，如果不能領會『春秋』具有家言與官學兼融的特點，只偏重它的王官學或一家言，就不能真正體會孔子、『春秋』的真意。他以此為標準，來批評歷代研究孔子『春秋』學者。

33) 『國學概論』說：“孔子者，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而『六經』則中國學術史上著述最高之標準也”(第3頁)。錢穆對孔子的推崇，從未改變。他對『六經』的看法，也基本上沒什麼變化：他比較尊崇『春秋』。『秦漢史』、『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等對『六經』在漢唐宋明清學術史的地位變化，有較深入的闡述。

34)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90頁。

35)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302-303頁。

36) 錢穆在『秦漢史』(第242-243頁)也有相同的看法，稱讚漢儒災異說有其“精卓”之處。

37) 錢穆主張傳統社會的特點之一是學術領導政治，這也是他的理想之一。他在不少著作常常提到這點，如『中國學術通義·序』說：“學術為文化導先路。苟非有學術領導，則文化將無向往。非停滯不前，則迷惑失途。”(『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5冊，『序』，第3頁)；『經學大要』，第46頁；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臺北：東大圖書，2005年，第65頁。這種風氣、規範是在漢武帝至宣帝時由經學家共同建立的(『經學大要』，第208頁)。

錢穆稱讚只有司馬遷(約前145或135-前90)、王通(584-617)能明白『春秋』這一特點。『史記』深得孔子『春秋』之精髓，彰顯家言，且要成為漢代新經學。<sup>38)</sup>王通想繼承孔子，以一一人之家言，來成為新王的官學。<sup>39)</sup>

錢穆慨嘆漢代以後有些學者只知『春秋』是王官學，說孔子承續周公，把『春秋』當作史書，而不知道『春秋』是部亦子亦史的經、亦經亦史的子。杜預(222-285)、孔穎達(574-648)、章學誠莫不如此。<sup>40)</sup>

錢穆批評唐代人以史學眼光看古代經籍，認為孔子淵源於周公，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唐人沒有王官學與百家言分野的觀念，只代之以經、史分類的觀點。唐代在學術史是‘古今一大變’。<sup>41)</sup>錢穆不贊同韓愈(768-824)提倡的‘一統觀’的道統觀(認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道一線相傳)，稱許漢代『公羊』學的‘多統觀’的道統觀(‘存三統’)：每一新王朝興起，前兩個王朝的後代就得更改，三統不斷在更新。孔子在漢代是素王，『春秋』是新王。錢穆也不滿韓愈所提的人道，而認同西漢儒所重的王道——王道包括人道，王道是人道最高的表現。韓愈的看法泯滅了王官學與百家言之辨。<sup>42)</sup>

錢穆批評清代三儒：他批評章學誠僅知王官學，不知百家言；只懂史事，不懂經義；感慨龔定庵(1792-1841)不了解孔子、先秦家學精神，不了解荀子所說的‘法後王’是指‘法孔子’；批評康有為(1858-1927)只承認戰國以下的百家言，而不承認百家言以前的傳統王官學；只重經義，而忽略史實。<sup>43)</sup>

錢穆批評現代學者研究孔子的方法有問題：或只研究孔子的哲學、思想，或只從西洋史、西洋哲學史立場來研究孔子，這都把孔子從中國史、中國思想史裡抽離出去。<sup>44)</sup>錢穆強調研究經學，既要從史學來研究，又要從經學大義來研究，把經義與史實交融一起，經史兼

38) 錢穆，『太史公考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第29-30頁；『史學名著』，第90、107-110頁。

39)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86-291頁；錢穆，『讀王通中說』(『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第1-15頁)對王通其人、其書有詳論，可參看。

40)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86-291頁。

41)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90-292頁。

42)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93-294頁。錢穆「雜論唐代古文運動」(『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對韓愈的生平、不同文體寫作與創新、文學貢獻、思想做詳盡論述，並予肯定。他指出韓愈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道治其文(第41頁)，主張即文見道，尊仁義乃本於人道、儒家宗旨，論天事則採道家見解(頁59)，獨尊儒統，力排釋老，繼承堯舜以來的道統，影響宋儒(第67頁)。錢穆不同意韓愈的道統觀，他1961年(時年六十七)發表的『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指出韓愈的道統觀受禪宗影響。韓愈的道統觀是“主觀的、單傳孤立的、易斷的道統觀”，紕繆很多。見錢穆：『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載『中國學術通義』，第97頁。

43)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303、306、308頁。荀子對先王、後王的看法，參楊兆貴·吳學忠，「論荀子及其後學對周公的論述」，『人文論叢』2016年第1輯，第3-13頁。

44)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308-309頁。

通。45)錢穆認為中國傳統學術重和合、重會通，與西方重分別、重專家不同，中西文化不同，學術不少領域亦各有自己的特點。

由上所論，錢穆『孔子與春秋』的一些見解與他平時立論殊異，如對董仲舒、『公羊』學、韓愈道統觀、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等的評價與他平時立論不同。這點值得我們注意。錢穆如此推崇『公羊』學所闡的孔子『春秋』精神，高倡以百家言而成新王官學，與他1960年在『讀詩經』裡對周公推崇備至，似有唱雙簧之妙。46)雖然錢穆說自己偶然重讀皮錫瑞(1850-1908)『經學通論』，該書涉及許多經學上的問題，他心中有許多心得，就寫此文，47)但他屢屢強調漢儒‘通經致用’，能在政治上大展拳腳。我們似乎從這一線索並結合時代背景，可見錢穆的作意。錢穆寫這篇鴻文，另一目的應是不滿晚清以來今文家對孔子『春秋』精神的理解差異與局限，而重揭孔子『春秋』精神。48)

### 3. 錢穆談『春秋』三傳

錢穆發表『孔子與春秋』十年後，1964年發表『中國古代散文——從西周至戰國』，除了闡論『春秋』字法句法規範化現代化外，認為『春秋』三傳的寫成時間早晚的次序是『公羊』、『穀梁』、『左傳』，原因是三傳同記一事，『左傳』抄襲或剪裁『公』、『穀』而成，而『公』、『穀』似同出一源，『穀梁』就『公羊』所記而加以修飾。『公』、『穀』的作者應是子夏弟子或再傳弟子。『左傳』不少出自荀子門下手筆。49)錢穆提出這些看法，沒有羅列證據，詳加論證，實有臆說成分。

錢穆『史學名著』(1970年)有專章談『春秋三傳』。他簡略談了『左傳』是否傳『春秋』、是否左丘明所作及三傳異同，談了『左傳』在先秦漢代的流傳中，吳起(約前440-前381)很有關係，『左傳』到東漢仍是流傳於民間的古文。劉歆不可能偽造『左傳』。

錢穆花較多篇幅談『左傳』的歷史價值，認為『左傳』是編年史的正式完成。通過『左傳』，可以研究春秋時期的天文曆法、地理、氏族、政治制度、朝聘盟會制度、稱謂、軍事、外交辭令、各種禮俗、信仰、食貨經濟、工商業、四裔、年表等。要研究三代、讀前四史，『左傳』是一個靠得住的基礎和標準。50)錢穆沒怎麼談『公羊』、『穀梁』。只說《公》

45) 錢穆，『經學大要』，第118-119頁。經史兼通，不僅是錢穆提出的研究法，而且是很多通儒所提倡的。

46) 參楊兆貴，「論錢穆先生《詩經》學研究」，『中國經學』(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經學研究中心)第22輯(2018年6月第一版，頁147-165)。

47) 錢穆，『經學大要』，第145頁。

48) 江毓奇，「論錢穆對於“漢代經今古文”論爭所涵蘊問題之處理」，第32頁。

49)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第567、571頁。

《穀》在西漢設博士，是今文，兩傳與齊學、魯學有關。另，他已在『孔子與春秋』詳闡『公羊』的精神。因此，他對『春秋』三傳談論最少的是『穀梁傳』。

### III. 錢穆評論漢代『春秋』學

上文從王官學與百家言角度論述了錢穆論孔子『春秋』、『公羊』學所闡釋的孔子『春秋』的精神。下文也從這一角度論述錢穆的漢代經學研究。

錢穆1930年(時三十六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下簡稱『年譜』)，1932年(時三十八歲)在北大講『秦漢史』，自編講義(即1957年自刊的『秦漢史』)，1944年(時五十歲)發表『兩漢博士家法考』。這幾個論著都論及漢代經學、『春秋』學。錢穆的看法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年譜』主要是反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所說的劉歆偽造古文經說(也反駁廖平[1852-1932]謂西漢今文經博士家法相傳而每每與古文對立說)，根據『漢書』有關劉向(前79-前6)、劉歆(前50-23)父子及相關史料加以編年，論證劉歆偽造古文經說不成立，<sup>50)</sup>也指出從漢武帝至東漢初期期間的學術思潮。『秦漢史』‘第三章第一節學術之復興’、‘第五章昭宣以後之儒術’論及漢代學術、經學。本書沒有詳論經學博士演變過程，‘昭宣以後之儒術’在『年譜』的基礎上指出當時主要三種思潮：災異論，禪讓論，禮制論。『兩漢博士家法考』主要根據『漢書』及前兩種著作闡論漢代博士制度演變、經學博士師說家法的淵源及演變，反駁晚清學人過分倡議漢代經學今古文家法說。<sup>52)</sup>下文根據這三種著作論述錢穆對漢代經學、『春秋』學的看法。

#### 1. 錢穆對漢代經學‘今古文’的看法

錢穆論先秦、漢代學術思想演變主要從王官學與百家言這兩大分野來闡釋。他認為西漢經學‘今古文’之別，一再強調不是文字今古之別，而是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別。他反對王國維(1877-1927)古文用籀文寫、今文用隸書寫的說法，<sup>53)</sup>認為『史記』裡的‘古文’指『詩』『書』『六

50) 錢穆，『史學名著』，第35-61頁。

51)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第4頁。江毓奇「論錢穆對於“漢代經今古文”論爭所涵蘊問題之處理」一文以錢穆“問題意識”為出發點，從“歷史脈絡下的考證方法”、“歷史概念的釐清與歷史事件的闡發”、“史觀的理解與闡釋”來論述錢穆對漢代經今古文之爭的解決方法。

52)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第183頁。

53) 錢穆，『經學大要』，第153頁。

藝』。如他舉『史記·五帝本紀』“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為證，說這裡‘古文’與‘百家言’是相對而言，即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別，而非文字古今之異，因此推斷史公時期沒有古文、今文之別之觀念。<sup>54)</sup>又如他舉劉歆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移讓太常博士書』為說，指出此書中“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的‘古文’指舊書；它與『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是古文舊書，同指王官學『六藝』，而非百家言的諸子傳記。<sup>55)</sup>可見，由史公到劉歆所說的‘古文’，並非指經學中的文字字體，而是指『詩』『書』『六藝』。

錢穆認為西漢經學今、古文字之別，只有一部『尚書』。當時『尚書』有兩個版本：一是晁錯(前200-前154)到伏生(約前260-前161)家受讀而用當時通行的字體寫的二十八篇今文『尚書』，後被漢武設為博士。一是用古體字寫的孔安國『尚書』，也即劉歆請立博士的那本。<sup>56)</sup>所以西漢人討論的所謂‘今文’、‘古文’就是這部『尚書』。<sup>57)</sup>

總之，錢穆認為西漢經學‘今古文’的不同，不是指文字今古的不同，而是指學術上的古學、今學之別，即王官學與百家言之殊。

錢穆指出，經學到了東漢，有所謂今文學(今學)與古文學(古學)之別。今文學立博士，為官學，守章句；古文學不立博士，沒有章句，多博覽群書，兼通古今，不為章句，舉其大義。<sup>58)</sup>就『春秋』三傳言，『公』『穀』在西漢是今文，設博士，下至東漢，『左傳』仍是民間私學，稱為‘古文’。<sup>59)</sup>東漢‘古文’一指文字，一指『古文尚書』。

漢代經學‘今古文’之別是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學者的看法紛紜。周予同(1898-1981)認為今古文之別是指那些經書的書寫文字、字句、篇章、書籍中的意義、學統、宗派、對古代制度及人物的批評、對孔子的看法等等的殊異。<sup>60)</sup>屈萬里(1907-1979)贊成王國維文字不同

54) 錢穆，『經學大要』，第153-154頁。

55) 本段『漢書』引文見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969頁。錢穆的說法，見『劉向歆父子年譜』，第80頁。

56) 錢穆，『經學大要』，第173-174頁。

57) 參楊兆貴，「論錢賓四先生〈尚書〉學研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編，『戰後台灣的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二次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15年11月12、13日。

58) 錢穆，「東漢經學略論」，『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第44、47-48、50頁；『經學大要』，第195、196頁。

59) 錢穆，『史學名著』，第39-40頁。

60)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載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頁。但周氏的看法值得商榷：他把『莊子』、『荀子』、『商君書』、『禮記』、『論語』中提到『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一次序的全歸入今文學派，忽略了這幾本成書年代、思想學派歸屬，也忽略了這一次序可能在先秦漢代就已存在的事實，且是諸子的共識，又忽略了前代不同書籍、諸子的觀念對後代的影響。另外，他指出今文家認為孔子是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古今文學認為孔子是史學家。這一看法也很絕對、太過主觀。不同學派的學說互相影響、吸收、批評，促使學派學

說，並認為經今古文的不同還有經文、解說經義的不同。<sup>61</sup>楊向奎(1910-2000)認為今古文之爭的核心在於對『左傳』、『周禮』二書性質的確認。<sup>62</sup>錢穆認為經今古文之別是王官學與百家學之異，是他的一家之見。贊同者似只有林慶彰，<sup>63</sup>其他學者從不同方面修正或反駁這一看法，如夏長樸、鍾哲宇指出漢代‘古文’包括古文字、秦以前的典籍、古文經或古文學的簡稱，而不限於用當時隸書或古時文字所寫的書籍。<sup>64</sup>林惟仁也認為‘古文’不單指『詩』『書』『六藝』，也應包括古字、古書；批評錢穆未能解釋作為西漢王官學的‘古文’如何演變成東漢的古文字；錢穆也忽略今古學治學內容的不同，且混淆治學方法與治學內容之異。<sup>65</sup>可見，錢穆對經今古文的看法未必符合史實，因而未能得到學界廣泛認同。

## 2. 錢穆論漢代『公羊』『穀梁』設置博士及其家法

錢穆認為漢代博士有其淵源，戰國時期齊‘稷下先生’與‘博士’異名同實，其後秦代也設博士，所掌的有『六藝』及百家學，及到漢文、景帝時也如此。<sup>66</sup>漢武只設『五經』博士，盡黜百家博士。從此，五經博士力求發展，出現不同經說。這就出現石渠閣議。

### 1) 論宣帝石渠議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錢穆認為石渠閣議是西漢經學史上一件重要的事。該閣議在宣帝甘露三年(前51)舉行。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親制臨決，乃設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錢穆指出石渠閣議的背景，是自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後，說經成為利祿之途，於是說者日眾，經說也日益詳密，由於經師對經說的說法愈多愈繁愈殊，於是宣帝“謀整齊以歸一是”；若經說有一個最高的標準，就在一經中分數家，各立博士。此事的目的是“欲永為定制，使後之說經者限於此諸家，勿再生歧異也。”<sup>67</sup>

說發展、變化。周氏此見缺乏發展觀。

61)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年，『敘論』，第6頁。

62) 車行健，「論楊向奎的經今古文學觀」，『政大中文學報』，第21期，第66-68頁。

63) 林慶彰，『錢穆先生的經學』，第10頁。

64) 夏長樸，「王官學與百家學對峙——試論錢穆先生對漢代學術發展的一個看法」，載氏著，『儒家與儒學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年，第211頁；鍾哲宇，「『史記』“古文”詞商兌」，『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17期，第27-40頁。

65) 林惟仁，「錢穆論兩漢今古文及其相關問題」，第178-185頁。

66)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第183-194頁。

漢武時設置的『春秋』博士是指『公羊』博士，『穀梁』尚未設博士。據『漢書·儒林傳』記載，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sup>68)</sup>錢穆認為『五經』經說雖有歧異，但差別不大，只有『公羊』、『穀梁』兩家說『春秋』的差別較大。因此，他認為石渠閣議召開，是為了解決《公》《穀》的不同是非而起的，<sup>69)</sup>石渠之爭，乃是『公羊』與『穀梁』一家與一家之爭，而非後世所說的今古文經學之爭。<sup>70)</sup>錢穆此見與周予同相同，周氏不把這次閣議視為經今古文之爭。<sup>71)</sup>

錢穆指出『穀梁』之所以能在此次閣議立博士，是因為『穀梁』在學理上“媚漢而爭顯”：『穀梁』特尊周天子。他舉『春秋·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比較三傳的說法，『左傳』、『公羊』都以戎為戎狄，而『穀梁』卻以戎為衛國，說“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sup>72)</sup>稱衛為戎人，是因為它劫持了天子的使臣，與強調天子的使臣大相違背，因此，『春秋』貶稱衛為戎。錢穆認為此乃『穀梁』創說以尊王室，也即取悅漢室而爭出風頭。<sup>73)</sup>當然，宣帝聽說戾太子喜好『穀梁』，設『穀梁』博士是為了盡其孝心，且『穀梁』親親之義可為此提供較好的解釋。這也是原因。<sup>74)</sup>

錢穆對『穀梁』的批評，與他在『孔子與春秋』裡褒揚『公羊』的精神是一致的，抑彼揚此。『穀梁』、『公羊』在西漢互有爭辯，兩者學風各有所重。錢穆把『穀梁』歸為魯學，視『公羊』為齊學。他對齊、魯二學的態度不同：稱讚魯申公為人為學，“純謹一流”；其弟子徐

67)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26頁；『秦漢史』，第229、230頁；『兩漢博士家法考』，第218頁。此次閣議明顯是以政治力量決定學術問題，與錢穆一貫主張的以學術領導政治的看法相反。

68) 班固，『漢書』，第3618頁。錢穆贊同班固之見。

69) 錢穆，『秦漢史』，第230、232頁；『兩漢博士家法考』，第219、220頁。

70) 錢穆，『經學大要』，第175頁。

71) 周予同，『經今古文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第10-11頁。

72) 范甯集傳，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頁。按：本句『左傳』的解釋可以說是交代事情的經過：“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54-55頁)說戎人曾見周桓王，獻布幣給公卿做禮物，但凡伯不用招待賓客的禮數招待他。這年冬天凡伯由魯國回洛陽途中的楚丘被戎人抓去。這就交代了戎人抓凡伯的始末。『公羊』的解釋是說尊敬凡伯：“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7頁)『公羊』認為『春秋』記戎人攻打凡伯，是為了尊重凡伯，不允許夷狄隨便抓走中原的官員。

73) 錢穆，『秦漢史』，第235頁。

74) 郅積意，『論漢代〈公羊〉、〈穀梁〉之爭』，『孔孟學報』，第80期(2002)，第52-58頁。黃啟書，『西漢經學的另類戰場：從宣元成三朝災異說之發展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52期(2016年3月)，第55-56頁。

偃、周霸‘不事阿合’；指出治魯學的都能“純謹篤守師說，不能馳騁見奇，趨時求合”；批評齊學‘恢奇駁雜’、‘以陰陽災異推論時事’，此即所謂漢儒‘通經致用’、‘以儒術緣飾吏治’。<sup>75)</sup>可見，錢穆對齊學的態度比較複雜甚至有些矛盾，既批評他們學術駁雜，又把他們學、行當作漢儒的典範。或者齊學的學風與其地的學者本來就這樣，錢穆指出他們的本來面目。

## 2) 論經說家法師法興起

錢穆認為，宣帝石渠閣另立三博士，本來想使經說整齊歸一，不再有異說，但以後博士經說分家，經學分派別，卻因這件事而起。<sup>76)</sup>自昭、宣之後，漢博士經學分經分家而言‘師法’，凡『儒林傳』說‘由是某經有某家之學’，其事都是晚出的，該經且已分派，反證昭、宣以前，博士經學諸家說經雖有異同，但未分派別，未成家數。<sup>77)</sup>

錢穆就『五經』的每經傳授說明每經每家出現師說、家法的情形。他根據『漢書·儒林傳』的記載繪制『左傳』、『公羊』、『穀梁』三傳的傳授圖。此不贅述。他沒有詳論章句學的內容、發展。學者就此進行研究，填補這方面的知識。<sup>78)</sup>

## 3. 錢穆論劉歆請建『左氏春秋』等古書及『移讓太常博士書』

劉歆請建『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這些古經籍是西漢末年經學史上的一件重要事情。據『漢書·劉歆傳』記載，劉向、歆父子都治『易』。劉歆後來校秘書，見到古文『左傳』，甚是喜歡。哀帝建平元年(前6)，劉歆請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列於學官。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這幾本經書的大義，但博士們置之不理，於是劉歆寫信責讓太常博士。

錢穆『年譜』分析這封書的內容，指出劉歆此書中“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的‘古文’指舊書；“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的‘古文舊書’，與『毛

75) 引文見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第183-194頁。錢穆特欣賞漢儒能“通經致用”，而齊學就是此典範。因此，錢穆對齊學的態度顯然不是一致的。

76)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221-222頁。

77) 錢穆，『秦漢史』，第223、229頁；『兩漢博士家法考』，第217頁。

78) 張厚齊「兩漢章句之學歷史考源與發展例釋」(『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4期)研究章句學發展，把章句分為“離章辨句”、“分文析字”兩形式，並把章句分為小章句、章句、大章句、簡省章句、變體章句五階段。郗積意「宣、章二帝與兩漢章句學的興衰」(『漢學研究』，第25卷第1期)分析宣帝一些措施如分立博士促使章句學發展。姜龍翔「兩漢博士師法、家法探析」(『華梵人文學報』，第13期)探析師法、家法與經學發展的關係。

詩』、『逸禮』、『古文尚書』都是古文舊書，‘古文’即‘舊書’，“『詩』『書』古文，同指『六藝』，皆謂戰國以前舊書，以別於諸子、傳記”。劉歆之意在說明這四本書與朝廷博士諸書同類，而不是說這些是古文，與朝廷博士今文不同類。劉歆所說的，“正欲顯其同，非以別其異”，<sup>79)</sup>正因這四本書與博士經學都是‘古文’，所以才要求設立博士。易言之，錢穆仍用王官學、百家言分野觀念來分析這些‘古文’，認為劉歆要建的這幾本‘古文舊書’乃是王官學，因此與當時列為學官博士的其他經籍是同一類別，而非文字古、今之別。

這仍是錢穆的一己之見。學者的看法與此大多迥異。劉巍經考證認為‘古文舊書’不僅指『逸禮』、『尚書』，而且包括『漢志』所著錄的『春秋古經』，也即許慎『說文解字序』裡稱‘壁中書’之一的『春秋』，而『毛詩』不在其列。<sup>80)</sup>劉起鈞認為劉歆本來研習今文，要把藏在秘府的‘幾部古文經’交博士傳習，建於學官，結果得罪了今文家博士。<sup>81)</sup>易言之，學者認為劉歆所要建的是古文經，而非‘正欲顯其同’的‘王官學’。學者還指出，劉歆反對今文學的煩瑣學風，反對把孔子稱為素王。<sup>82)</sup>可見，劉歆與今文家博士在一些看法殊異，導致彼此產生鬥爭。錢穆只側重討論劉歆的‘古文舊書’，對其他方面討論很少。

#### 4. 錢穆論漢代『春秋』經義經說

錢穆在相關的論著裡沒有專門論述漢代『春秋』經義、經說的。筆者認為，漢儒對『春秋』經傳義理有較多較深的了解，並能‘通經致用’，應用在現實政治中，取得一定成效。錢穆必注意及此，只是未專門論述而已，因此，本文這部分採掇錢氏相關文字，集合成節，加以論述。在錢穆觀念下的西漢經學有王官學與百家學之異，而沒有文字古、今之殊。他認為，『春秋』是官學，研治『春秋』的名儒者大都能通其他兩三傳，即所謂‘通學不分今古’。本節就錢穆所論，疏理出幾種情況：漢儒有兼治『左傳』『公羊』的，有治『穀梁』而用『公羊』義的，有治『左傳』、『穀梁』而用今文家說的。下文簡論之。

79) 本段『漢書』引文見班固，『漢書』，第1969頁。錢穆的說法，見『劉向歆父子年譜』，第80頁。

80) 劉巍，「讀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漢代經學“古文”爭議緣起及相關經學史論題探」，『社會科學研究』2012第4期。

81)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15頁。

82) 張建會，「從〈移讓太常博士書〉看漢代今古經學的鬥爭——兼論劉歆的“孔子觀”」，『昭通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 1) 漢儒論『左傳』、『穀梁』經說兼採『公羊』說

## (1) 張敞兼治『左傳』、『公羊』

錢穆根據『漢書·張敞傳』記張敞在昭帝地節三年(前67)上封書提到季友、趙衰、田完受封的三件事，指出這三件事『公羊』、『穀梁』都沒評論，則張敞治『春秋』，當見過『左傳』。又『郊祀志』說張敞‘好古文字’，『左傳』多古字，與張氏之學相吻合。他又指出，譏世卿乃『公羊』之義。張敞引用其說，證明當時漢儒‘通學不分今古’。<sup>83)</sup>

## (2) 劉向治『穀梁』而用『公羊』譏世卿、尊王義

錢穆以劉向在元帝時上疏為根據，說：“向治『穀梁』，而此疏用『公羊』義，其『條災異封事』，如祭伯奔魯，尹氏世卿，亦均『公羊』說。後人必謂漢儒經學守家法不相通，其實非也。”<sup>84)</sup>

按此疏是劉向在元帝永光元年(前43)所上的，劉向因痛恨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上書元帝，結果被弘、石發現，被抓入牢，更免為庶人。元帝後來重用周堪、張猛，劉向“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此疏提到“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sup>85)</sup>『春秋·隱公元年』記“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左傳』的解釋是：“祭伯來，非王命也。”<sup>86)</sup>『公羊傳』的解釋是：“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sup>87)</sup>『穀梁傳』的解釋是：“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鏃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sup>88)</sup>比較『公羊』、『穀梁』的解釋，其意思差不多，都強調天子的權威，強調在天子統治範圍內，沒有天子的命令，就不能稱‘奔’，不能單獨出去會見諸侯。『穀梁』解釋比『公羊』更詳細。

可見，元帝時代經學家仍兼治多經，而且互採經義、經說，而不只守一經一師一家之說。錢穆『秦漢史』，第五章「昭宣以後之儒術」之‘宣元以下博士之增設與家法興起’節都論述了昭、宣及以前五經博士最初不限於一家一人，博士不限於專治一經，博士弟子也不限通一

83)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14頁。

84)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38頁。

85) 兩段引文見班固，『漢書』，第1932、1936頁。

8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19頁。

87)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第23-24頁。

88) 楊士勛，『春秋穀梁傳注疏』，第7頁。

藝。<sup>89)</sup>劉向此疏在元帝時寫成，他學『穀梁』而採『公羊』說。他到漢末去世，則西漢末年學者研治『春秋』三傳，仍可兼採不同傳的師說。

又，錢穆在『年譜』元帝竟寧元年(前33)評論劉向此疏，但他在『年譜』把劉向此疏繫於元帝永光元年(前43)，若讀者不小心，很容易誤會，以為劉向此疏是在竟寧元年。

### (3) 劉向治『穀梁』而採『公羊』三統說

漢成帝建始二年(前32)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後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永始元年(前16)罷昌陵，重設延陵，但是制度仍奢侈。因此，劉向上疏諫勸：“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云云。<sup>90)</sup>錢穆指出：“講天命非獨一姓，尤可注意。其先『公羊』家言三統受命，本以解釋漢室之起平民為天子，至是漢德日衰，乃以警庸主，而轉為新莽斬榛莠，除先道焉。”<sup>91)</sup>所謂‘三統’說，錢穆『孔子與春秋』稍加闡釋，即『公羊』認為三王之前有五帝，五帝之前有九皇，但歷史上所謂三王、五帝不是固定的專屬於何王何帝，而是每一新王朝興起，就保留以前個兩王朝的後代，為之封君建國，讓他們仍舊遵行前朝的傳統、制度，與新王朝同時並存。<sup>92)</sup>

錢穆在『年譜』『秦漢史』指出，漢儒講陰陽之運、五德轉移、帝王沒有萬世一姓、禪讓等說法。宣帝元鳳三年(前78)眭孟推衍『春秋』之意，指出“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sup>93)</sup>此『春秋』指『公羊』，因為在石渠閣立『穀梁春秋』博士之前的『春秋』都指『公羊』。<sup>94)</sup>因此，眭孟推衍『春秋』之意，即推『公羊』家言。可見，『公羊』主張禪讓。元帝神爵二年(前60)寬饒引『韓氏易傳』指出‘五帝官天下’、‘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錢穆指出：由眭孟至寬饒不到二十年，“當時學者敢於依古以違時政如是。又深信陰陽之運，五德轉移，本不抱後世帝王萬世一姓之見。”<sup>95)</sup>劉向作為漢室宗親，也深受此說影響。<sup>96)</sup>

不僅宗臣劉向受此說影響，即使漢帝如成帝也相信此說，他在綏和元年(前8)下詔說：“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sup>97)</sup>可見三統說影響相當深廣。

89) 錢穆，『秦漢史』，第216-219頁；『兩漢博士家法考』，第205-211頁。

90) 班固，『漢書』，第1950頁。

91)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50頁。

92) 錢穆，『孔子與春秋』，第271頁。

93) 班固，『漢書·眭弘傳』，第3153-3154頁。

94) 錢穆，『秦漢史』，第230頁；『兩漢博士家法考』，第218頁。

95)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18頁。

96)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50頁。

## 2) 劉歆兼治『穀梁』『左傳』，引今文說

『漢書·韋玄成傳』記丞相孔光(前65-5)、大司空何武(?-3)在哀帝即位那年(成帝綏和二年，前7)上書，指出根據宗廟迭毀之制，該毀武帝之廟。劉歆七月上疏，指出要存武帝之廟，因為武帝文治武功彪炳：南征北伐，“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並引『禮記·王制』、『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左傳』“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尚書』“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說，來論證“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提出武帝之廟不可毀的看法。<sup>98)</sup>

錢穆指出，劉歆此奏，已引『左傳』；而根據『禮記·王制』、『穀梁傳』言及七廟，引周公『毋逸』舉殷三宗，也用今文說。劉向研治『穀梁』，劉歆承家學，又治『左傳』，採用今文說。由此奏可見後人說西漢儒家治經分開今古文，不通今古文，是不合史實。<sup>99)</sup>

按錢穆指七廟、三宗說是‘今文說’，則與他的經‘今文’指百家言說不同，有矛盾之處。可見，錢穆雖強調今古文之別是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別，但他可能受其他學者說法的影響而不自知，所以在論述中出現矛盾情況。

## 5. 錢穆論『春秋』與漢代學風思潮的關係

錢穆指出，昭、宣以下學風思潮，主要有三：漢儒論災異、論禪讓、論禮制。『春秋』與這三種思潮有關係，尤其與災異說、禪讓說的關係比較密切。

## 1) 『春秋』與災異說的關係

災異說是西漢中晚期一個極重要的學說，它結合經義與天人相與說，影響學術、思想、政治等方面。<sup>100)</sup>錢穆指出，漢儒講經術而涉及災異，始於董仲舒。董及其後儒家講災異，其特點是本天文以推人事。漢儒講災異比較有名的有眭孟、夏侯始昌、夏侯勝、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田終術等，他們“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

97) 班固，『漢書』，第328頁。

98) 以上引文班固，『漢書』，第3126、3127頁。

99)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72頁。

100) 黃啟書，前引文，第46頁。

中。”<sup>101)</sup>災異說對漢廷的影響，主要是講災異的多遭罪辜，三公亦多以災異而被罷免，朝廷用人，也往往因災異而變。

錢穆分析漢儒言災異的原因，是武帝以後，朝廷以復古、隆古為理想，儒士立言，亦與漢初譏評秦亡的故調不同，而轉據經術，“其大者則曰『春秋』與陰陽。蓋一本人事，一藉天意。藉天意則尊，本人事則切。故漢之大儒，通經達用，必致力於斯二者。”<sup>102)</sup>其中董仲舒、劉向等都能把陰陽災異與『春秋』經說結合起來，把災異說比附於『春秋』。

可見，『春秋』在災異說思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原因一是漢儒相信孔子『春秋』為漢制法，斷獄陳疏多引『春秋』，一則『春秋』褒貶極嚴。然而，“『春秋』褒貶雖嚴，孔子聖德雖尊，以之繩下則有餘，以之裁上猶不足。故漢儒經術，探其致用之淵，必窮極深微於陰陽災異之變。”<sup>103)</sup>因為災異本來要譴戒人君失德，而經術之士高倡災異說，目的之一是限制君權。錢穆曾批評董仲舒陰陽說尊君(見前文)，此處則稱讚董說限制君權。陰陽災異說既有利限制君權，又有利提高君權，對君權來說是一刀兩刃。<sup>104)</sup>錢穆對董仲舒及陰陽學說對君權的影響，沒有展開深入論述，實在遺憾。另，可見錢穆評騭人物思想，往往因時因地因事而言，褒貶揚抑，不可一概而論。

## 2) 『春秋』與禪讓說的關係

錢穆指出災異說與禪讓說的關係：雖然災異說可策免三公，但漢儒災異說的精神是針對天子，“於是有天子失德，上天譴告，災異迭見，當遜位讓賢之論。此則漢儒說災異至愚至誣之見，一轉而為至精至卓之義矣。今考其論，亦源於符瑞受命之說，而旁通於『春秋』。”<sup>105)</sup>可見，『春秋』與禪讓說有密切關係。至於讓賢論的內容，實則與五德轉移論相結合。『國史大綱』對五德轉移論有簡要說明，其程序是這樣的：一聖人受命，二天降符瑞，三推德定制，四封禪告成功，五王朝德衰，天降災異，六禪國讓賢，七新聖人受命。<sup>106)</sup>

錢穆指出，漢儒首唱漢室當傳國之說的是眭孟。他受『春秋』於嬴公，是董仲舒的再傳弟子。昭帝元鳳三年(前78)，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大柳樹斷枯臥地復立。眭孟推『春秋』之意，以石、柳屬於陰類，是下民之象，而泰山是岱宗之嶽，是王者易姓告代之處，說：“漢

101) 班固，『漢書』，第3195頁。

102) 錢穆，『秦漢史』，第241頁。

103) 以上引文見錢穆，『秦漢史』，第241頁。

104) 有關漢代災異說的發展情形、對君權影響，參周德良，「論漢儒災異論(上)——以董仲舒、〈白虎通〉為中心之察考」，『鵝湖月刊』，第25卷第5期。

105) 錢穆，『秦漢史』，第242-243頁。

106) 錢穆，『國史大綱』，第150-151頁。

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sup>107</sup>錢穆引『後漢書·賈逵傳』“『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說明當時儒者共信漢為堯後，所以眭孟不加引述。<sup>108</sup>眭孟提出“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即『公羊』家‘存三統’新周、故宋說。<sup>109</sup>可見，漢儒兼治『左傳』、『公羊』。眭孟本治『公羊』，而引『左傳』說，情況與上文所說漢儒治『左傳』『穀梁』而採『公羊』說相反。這可作為上文的補充。這也可見西漢儒研治《春秋》的都基本上能兼通三傳。

眭孟之後，蓋寬饒在宣帝神爵二年(前60)奏封事，提出“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sup>110</sup>錢穆指出，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即五德推移說。可見當時學者敢於依循古說、違逆時政，深信陰陽之運、五德轉移，不抱後世帝王萬世一姓之見。<sup>111</sup>其後谷永在成帝元延元年(前12)明言：“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sup>112</sup>谷永此見，是自元帝、成帝以來一時學者的意見，鼓盪蘊積，最後導致王莽篡漢。谷永“發明天意不私一姓，其義深切著明，固非後世拘儒所與知也。”<sup>113</sup>當然，這除了是當時學風及學者共同信仰，也是漢儒對秦始皇祈求帝位傳諸萬世之見的批判。

### 3) 『春秋』與禮制說的關係

錢穆指出，西漢儒家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兩個要點，一是災異與讓賢論，一是禮樂和教化論。<sup>114</sup>講符瑞、講災異、講禮樂，三者有關係。講災異禪讓，意在警惕，而禮樂之旨，在於裁抑。昭、宣以下講禮樂的，本之民事，王吉、貢禹首開其風。<sup>115</sup>元帝元初元年(前48)貢禹為諫大夫，上書奏言：“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云云，<sup>116</sup>都主張循古節儉，上復古禮，下卹民生，與武、宣二帝張揚禮樂粉飾太平的意態不同。<sup>117</sup>

107) 班固，『漢書』，第3154頁。

108)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11頁。

109) 錢穆，『秦漢史』，第244頁。

110) 班固，『漢書』，第3247頁。

111)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18頁；『秦漢史』，第244頁。

112) 班固，『漢書』，第3467頁。

113)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55頁。

114) 錢穆，『國史大綱』，第150-152頁。

115) 錢穆，『秦漢史』，第247頁。

116) 班固，『漢書』，第3070頁。

元帝、成帝以下，漢儒追慕古禮、鄙視秦制，匡衡(生卒年不詳)、梅福(生卒年不詳)首發其議。梅福在成帝時曾上書，“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sup>118)</sup>錢穆指出，漢儒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成帝下詔封孔子後世為殷紹嘉公，“漢廷據『左氏』立制，事始此。”<sup>119)</sup>

錢穆總結西漢學風有兩派，一是主張災異，一是主張禮制。主張災異的本之天意，主張禮制揆諸民生，強調儉約。這裡‘古文’都是漢儒談資的資源。

#### IV. 結語

錢穆一生服膺儒學，為故國招魂。儒家為孔子所創，孔子自從他的學生稱讚是聖人後，一直對後世中國經、史、子等傳統學術思想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其中作為五經之一的『春秋』，傳統學者多認為是孔子所著。漢儒說孔子行在『孝經』，志在『春秋』。錢穆也贊同此見。他對『春秋』的看法，不囿限於傳統經學之說，而視之為春秋時期的國際史。他推崇孔子有微言大義，認為三傳裡『公羊』最能揭櫫孔子尊一統之義，所以，從這一點來看，他特推崇『公羊』與董仲舒。又，錢穆認為孔子以百家言來寫『春秋』，『春秋』就是百家言的著作；它到漢代被奉為經典，懸為官方意識型態指導之書，是以子書而成為經書(官學)。這是錢穆尊奉的理想經典，也是他一生提倡的以學術指導政治說。另外，錢穆對漢代『春秋』學研究而有他一己之見的有三點：一是他一直堅持漢代經學‘今古文’之別不是文字上古今之別，而是王官學與百家言兩大分野之別。<sup>120)</sup>他認為西漢儒多能通古今，因此，治『左傳』、『穀梁』的多採『公羊』說。一是他極欣賞漢初至宣帝時的漢儒，他們能通經致用，提出禪讓說、五德轉移說。當然，錢穆『年譜』反駁康有為劉歆偽造群經說，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不必贅言。一是他一生對董仲舒、『公羊』學的看法前後有變，『孔子與春秋』以『公羊』學說來闡明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倡導以百家言而為新王官學，並以此為學術思想的至高標準。<sup>121)</sup>這一看法的背景、動機仍值得探討。

117)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34頁。

118) 班固，『漢書』，第2924頁。

119)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第60頁。

120) 朱愷『錢穆的漢代經學研究』指出錢穆認為漢代經今古文之爭實乃爭利祿、爭立官、爭博士弟子員，是他研究漢代經學的基本立場，終一生沒什麼改變(第10頁)。可作為此處的補充。

121) 余英時說錢穆“懸通儒之學為最高鵠的”(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第35頁)，固然符合錢穆一生所守，但『孔子與春秋』則別有所措。

附錄：錢穆有關漢代『春秋』學及相關論著發表繫年

1. 『國學概論』，1926年夏至1928年春寫成，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2. 『劉向歆父子年譜』，初刊於『燕京學報』1930年第7期
3. 『秦漢史』，1932年在北大開‘秦漢史’，自編講義，1957年香港自刊本
4. 『東漢經學略論』，1936年發表在『讀書週刊』，第67期
5. 『國史大綱』，194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6. 『兩漢博士家法考』，在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1944年第2卷第1號發表
7. 『中國思想史』，1951年完稿，1952年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8. 『中國古代大史學家——司馬遷』、『太史公考釋』成稿於1953年
9. 『孔子與春秋』，在香港大學『東方學報』1954年第1卷第1期發表
10. 『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1958年香港新亞研究所
11. 『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1961年在『新亞生活』4卷10期發表，後收在『中國學術通義』
12. 『中國古代散文——從西周至戰國』，1964年發表於『新亞中文系年刊』，後收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13. 『中國史學名著』，1970年為中國文化學院博士班學生開的‘中國史學名著’課程的講堂實錄。1973年三民書局出版
14. 『經學大要』，1974-1975年暑假在中國文化學院開課(1996年整編『全集』時就錄音整理成書)

## 參考文獻

### 一、書籍

-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范甯集傳·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梁淑芳,『錢穆<論語新解>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臺北:三民書局,1977年。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三民書局,1977年。
-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
- 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
- 錢穆,『國學概論』,『錢賓四先生全集』,第1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 錢穆,『孔子與春秋』,『錢賓四先生全集』,第8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 錢穆,『中國思想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4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5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 錢穆,『秦漢史』,『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6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第33冊,臺北:聯經出版社,1998年。
- 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年。
-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上海:上海書局,1992年。
-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0年。
- 夏長樸,『儒家與儒學探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14年。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余英時,『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書局,1991年。
- 鄭良樹,『百年漢學論集』,臺北:學生書局,2007年。
- 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二、期刊論文

- 車行健,「論楊向奎的經今古文學觀」,『政大中文學報』,第21期,2014年6月。
- 陳雅玲,「試由<劉向歆父子年譜>論錢穆的疑古與考古」,『衍學集』,2011年7月。
- 陳勇,「錢穆與<劉向、歆父子年譜>」,『西華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2期。
- 曹明,「錢穆<漢劉向、歆父子年譜>的學術史意義」,『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
- 丁亞傑,「顧頡剛春秋學初探」,『人文學報』,第23期,2011年6月。

- 郜積意,「論漢代〈公羊〉、〈穀梁〉之爭」,『孔孟學報』,第80期,2002年.
- 郜積意,「宣、章二帝與兩漢章句學的興衰」,『漢學研究』,第25卷第1期,2007年6月.
- 顧融德,「試評顧頡剛與錢穆的友情和學術交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2期.
- 黃啟書,「西漢經學的另類戰場:從宣元成三朝災異說之發展為例」,『臺大中文學報』,第52期,2016年3月.
- 江毓奇,「論錢穆對於“漢代經今古文”論爭所涵蘊問題之處理」,『問學集』,第15期,2008年4月.
- 李桂花,「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與現代疑古運動」,『思想戰線』,2001年第4期.
- 林慶彰,「錢穆先生的經學」,『漢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5年12月.
- 林惟仁,「錢穆論兩漢今古文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9期,2016年9月.
- 劉俊峰,「抗戰時期顧頡剛與錢穆學術理念的離合」,『齊魯學刊』,2016年第3期.
- 劉書惠·楊棟,「顧頡剛與錢穆學術交遊考」,『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7卷第2期,2017年.
- 劉巍,「讀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漢代經學“古文”爭議緣起及相關經學史論題探」,『社會科學研究』,2012年第4期.
- 楊兆貴,「論錢穆先生《詩經》學研究」,『中國經學』,第22輯,2018年6月.
- 楊兆貴,『論錢賓四先生〈尚書〉學研究』,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編:『戰後台灣的經學研究(1945-現在)第二次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15年11月12、13日.
- 楊兆貴·吳學忠,「論荀子及其後學對周公的論述」,『人文論叢』,2016年第1輯.
- 姚淦銘,「錢穆兩漢經學研究之方法論」,『河北科技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 張厚齊,「兩漢章句之學歷史考源與發展例釋」,『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14期,2016年10月.
- 張建會,「從〈移讓太常博士書〉看漢代今古經學的鬥爭——兼論劉歆的“孔子觀”」,『昭通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
- 鍾哲宇,「〈史記〉“古文”詞商兌」,『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第17期,2012年3月.
- 周德良,「論漢儒災異論(上)——以董仲舒、〈白虎通〉為中心之察考」,『鵝湖月刊』,第25卷第5期,1999年.

### 三、學位論文

- 朱愷,『錢穆的漢代經學研究』,上海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 中文摘要

### 論錢穆對漢代『春秋』學的研究

楊兆貴·趙殷尚

錢穆對秦漢史、漢代經學研究飲譽學林，影響很大。他這兩方面的論著大多已逾半世紀，在出土文獻日益增多、研究方法多元化等學風下，他的論著有哪些價值？對當代相關研究有什麼影響？筆者結合他這兩方面的研究，聚焦他的漢代『春秋』學，以見他治學、見解之一斑。

要探討他對漢代『春秋』學的看法，則先簡介他對『春秋』及三傳的看法。他與傳統主張孔子作『春秋』的看法相同，並從史學肯定『春秋』、『左傳』的史學價值。他認為漢代經學今古文之別是王官學與百家言之殊，而非文字古今之異。這是他論漢代經今古文最具特色的部分。他撰『孔子與春秋』一文，著重闡釋『公羊』學的精神，強調孔子『春秋』以百家言而成為新的王官學。他在不同時期對『公羊』學與董仲舒的評價不同。他認為漢儒多通古今，因此治『春秋』者多能兼採三傳或兩傳之義、說。他又指出，『春秋』學與漢代思想尤其是災異說、禪讓說、禮制說有密切的關係。

關鍵詞：錢穆，漢代，經學，『春秋』，公羊學，王官學與百家言

## Abstract

Study on Mr. Qian Mu's Research of 'Chun Qiu' in Han Dynasty

Yang, Zhao Gui (University of Macau)

Cho, Eun Sang (Pai Chai University)

Prof. Qian Mu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honorary scholars of Qin and Han history and Han dynasty studies. Most of his works in these two areas have been over half a century.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what is the value of his works? And what is the impact on contemporary related research? This essay combines his research in these two areas and focuses on his study of *Chun Qiu* in the Han Dynasty, so as to see his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s and insights. To explore his views on the study of *Chun Qiu* in the Han Dynasty, the first part of the essay introduces his views on *Chun Qiu* and the three 'Zhuan'. He is the same as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Confucius wrote *Chun Qiu*, and affirmed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Chun Qiu* and *Zuo Zhuan* from his historiography. He believe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and ancient literatures in Han dynasty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 and Philosophers, rather th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writing. He wrote the article *Confucius and Chun Qiu*, focusing on explaining the spirit of school of *Gong yang*, emphasizing that Confucius' *Chun Qiu* became a new official ideology with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Han China. He had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Gongyang* and Dong Zhongshu in different periods. He believes that the Han scholars are mostly integrated with the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s, so most of them who studied *Chun Qiu* can adopt the meaning and theories of the three or two 'Zhuan'.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study of *Chun Qiu*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oughts of the Han Dynasty,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catastrophe, concession, and etiquette.

Key Words: Qian Mu, Han dynasty, Chinese Classics, *Chun Qiu*, School of Gong Yang, Ancient Official Document and Philosophers

(투고: 2021년 07월 15일, 심사완료: 2021년 08월 06일, 게재확정: 2021년 08월 12일)